



语境·语义·语效： 论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的体系化建构

梁永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 要: 全球治理倡议话语是新时代中国关于全球治理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话语表达, 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从生成语境看, 全球治理倡议话语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话语的继承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全球治理话语的历史赓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汲取传承、对全球治理赤字和谋求合作共赢的责任担当。全球治理倡议话语以奉行主权平等, 筑牢治理根基; 遵守国际法治, 健全治理网络; 践行多边主义, 构建治理共同体; 倡导以人为本, 增进治理福祉; 注重行动导向, 提升治理效能为话语内核, 形成了涵盖话语基石论、话语保障论、话语路径论、话语价值论和话语原则论的科学体系。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的体系化建构, 对构建中国特色全球治理战略体系, 开创全球治理新范式; 壮大全球南方舆论声量和发展力量, 推动世界秩序转型; 有机衔接“三大全球倡议”, 赢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稳定环境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 全球治理倡议话语; 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7408(2026) 07 - 0028 - 10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 离不开全球治理话语的有力支撑。2025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 + ”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向世界系统阐述应对全球挑战、深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又一中国方案。2025 年 10 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强调,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作为具有重大原创性和时代性的复合概念, 全球治理倡议话语以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有机贯穿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逻辑架构, 深刻回答了“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 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课题, 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时代最强音。系统梳理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的生成语境、深厚语义和立体语效, 阐明全球联合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基金项目: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24LLWXB109)。

作者简介: 梁永涛(1994—), 男, 山东潍坊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法学博士,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指明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原则与路径,对消除治理分歧、达成治理共识、凝聚治理力量、实现治理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一、多维语境: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的生成逻辑

话语是对思想观念世界的现实主观反映,其生成和塑造遵循溯本理论原典、内涵历史源流、赓续文化根脉、呼应实践诉求的逻辑理路。“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的生成,承载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创新的深刻理论自觉,也是推动全球治理与时俱进的强烈历史主动,还是传承中华文化治理基因的高度文化自信,更是破解全球治理赤字、谋求合作共赢的坚定国际责任担当。

(一) 理论源泉: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话语的继承发展

科学理论是话语体系的内在支撑,为其提供理论源泉,决定了话语体系的思想厚度;话语体系则是科学理论的外化叙事,借助符号化编码与语译,拓展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场域。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系统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阐明了区域性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规律,揭示了世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伴随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水平提高、社会分工逐步细化,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现实的人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各民族之间,甚至突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交往联系越发紧密、世界历史初见雏形。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那样,“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其次,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分析了“真正的共同体”取代“虚假的共同体”的必然性,描绘了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形态。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3]。只有通过交往,不断变革原有的社会关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中人的“异化”状态,人才能摆脱对“物的依赖”,个人与共同体间的矛盾才能得到缓解,实现共同利益,迈向“真正的共同体”,最终人的本质属性得到充分展现,每个人实现自身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4]。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立意高远,以胸怀天下的战略思维赋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向国际社会贡献了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中国治理方案。

(二) 历史根基: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全球治理话语的历史赓续

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对外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全球治理话语随之呈现出多维样态。早在建党前夕,毛泽东强调,“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5],实际上已蕴含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如何自处与他处的智慧语涵。新中国成立后,从“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独立自主外交话语,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以“求同存异”处理国际

交往问题,创造性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其作为我国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再到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逐渐明晰,平等、正义、民主等治理理念进一步彰显。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关键历史节点,我国主流话语模式和基本治国方略开始发生“从‘革命—斗争’到‘改革—治理’”^[7]的重大转向,邓小平适时提出,“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8]的外交政策,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并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秩序的基础和“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基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对国际治理机制的冲击,江泽民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四个语域系统阐述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应相互信任,为全球治理指明了目标追求。胡锦涛则进一步从原则高度建构起全球治理的指导框架:政治上坚持平等与尊重,文化上强调互学互鉴,经济、安全 and 环境领域倡导合作共赢,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新时代,习近平以“全球治理倡议”重构国际秩序话语,在延续“破”之基础上,更加凸显“立什么、怎么立”的问题导向,中国逐步实现从全球治理参与者、建设者、改革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续写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全球治理探索与时俱进的新篇章。

(三) 文化根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汲取传承

全球治理倡议话语作为承载特定时代关于全球治理理念的文化载体,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智慧滋养。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协和万邦”“以和为贵”的“和合”话语彰显了中华文化视野中“全球治理”的底色。《尚书·尧典》写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表明家庭内部和谐促进了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又促进了国家间的尊重与合作,充分展现了处理国际关系中仁善、德行的重要作用。在“和”的基础上,形成“以和为贵”“和合共生”的治理观,多元并存的矛盾通过融合最终实现和谐包容。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和平共处、团结一心的一贯决心。这种跨越时空的理念传承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全球治理”底色的持久影响,彰显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的独特魅力与价值意蕴。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话语诠释了“全球治理”的目的。《礼记·礼运》中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体现了人们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墨子在《尚贤》中指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进一步将理想社会具象化:友爱互助、成果共享、携手共建。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治理领域更加复杂严峻的态势,习近平立足全人类共同利益,反复强调“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勾勒出关于未来美好世界的宏伟蓝图,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当代价值,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治理问题的高瞻远瞩与主动作为。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话语阐发了“全球治理”的原则。从《鱼我所欲也》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到《荀子·荣辱》云,“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再到墨子“兼相爱,交

相利”的主张，深刻阐明了在义和利的取舍中，中华文化主张互利共赢、重义轻利、义利兼顾。新时代在与非州的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强调“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坚持“真实亲诚”的工作方针，打造中非合作命运共同体。这既与传统义利观话语一脉相承，又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全球治理实践中赋予义利观话语以新的时代意蕴。

（四）实践场域：对全球治理赤字和谋求合作共赢的责任担当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地区矛盾冲突加剧，各种问题此起彼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逆全球化等甚嚣尘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机制被侵蚀；治理结构失衡、治理规则不公、治理过程不透明、治理效能不足等全球性治理赤字愈发凸显，各种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全球治理风险和挑战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国际关系治理的失灵和国际协调机制的失能表明，旧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已无法解决当前全球性发展难题，世界发展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新的国际形势呼唤全球治理话语调整重塑，全球治理倡议正是在这一历史节点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2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大国外交中创造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重要理念，为全球治理领域贡献了“上海精神”“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等“协商共襄”的中国方案。特别是全球治理倡议精准把脉国际治理体系的短板，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创新理念对准“西方中心论”“零和博弈”“以邻为壑”的难题，促进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自我觉醒，改变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作为被治理对象的陈规旧序，壮大全球南方话语声量和发展合力；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宗旨，以团结取代分裂、包容取代排他、合作取代对抗，为全球治理格局注入了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新元素；通过完善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的规范与准则，积极推进各国合作协同治理，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各项机制转型升级，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深厚语义：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的科学体系

全球治理倡议话语是新时代中国关于全球治理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系统表达，话语基石论、话语保障论、话语路径论、话语价值论和话语原则论构成了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科学体系，擘画了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坚定话语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增进发展共识的全球治理蓝图，彰显了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深邃的现实洞见。

（一）话语基石论：奉行主权平等，筑牢治理根基

“国家之间打交道，首先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摆在前面。”^[22] 主权平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全球治理倡议的话语基石。全球治理倡议话语主张世界各国拥有平等的治理参与权，无论是治理议程设定、议题选择、规则制定、决策表决等，各个国家都能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合理主张，维护本国的主权和尊严。第一，全球治理倡议话语遵循地位平等的治理理念。“坚持大小国一律平等，大家的事商量着办”^[23]，全球治理主体不仅包含发达国家，广

大发展中国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各主体突破经济发展、文化差异等阻力,围绕全球治理领域的安全、经济、文化、环境、疆域等问题平等商议解决方案,切实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努力推动达成一致治理共识,为后续开展合作奠定基础。第二,全球治理倡议话语坚持发展平等的治理模式。不同国家历史文化、发展进程存在阶段性差异,各国拥有依据实际情况选择治理方案和发展模式的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将自己的治理模式和发展路径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应始终遵循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以主权平等的国家身份展开合作。第三,全球治理倡议话语强调享有平等的治理指向。奉行主权平等的核心意涵,指向让全球治理成果更加公平公正惠及全球治理主体。世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成果应由各国共享,特别是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治理主体与客体享有者有机统一,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合理化。主权平等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多要素叙事,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将全球联合治理进行到底的坚定初心,彰显了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的本质要求,为筑牢多元参与、平等选择和享有的治理新格局奠定根基。

(二) 话语保障论: 遵守国际法治, 健全治理网络

全球治理体制的良性运转离不开法治的有力保障。全球治理倡议话语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2],反对恃强凌弱的“少数国家的法”,不断推动完善与公平治理相适用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一方面,伴随强权政治对世界秩序的介入,部分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违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抵制安理会决议,将本国法置于国际法之上,意欲弱化国际法权威性,使得国际治理领域的非正义现象和等级性特征日渐加剧。全球治理倡议“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3]。国际法作为适用于国际社会的通用性法律规则,绝不允许等同于“少数国家的法”,要以联合国宪章和宗旨为规则体系核心,秉承公平、正义等法治精神,使国际治理规则更具严密性和科学性。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加快全球治理法治化进程,并不意味着推翻现行的国际法,而是要坚持“扬弃”原则,既坚定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又变革全球治理规则中的不合理之处,保障全球治理体系运行更加流畅。为此,中国不仅在联合国改革和气候谈判等领域积极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落实,还主动提供理念类公共产品,以体制创新弥补规则不足,减少“我行我素”“双重标准”等情况发生,维护国际法的执行权威。另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元宇宙、人工智能新兴领域尚处于规则形成期,规则竞争博弈成为新一轮各国综合实力竞争的热点。全球治理涉及跨国数据流动、主权博弈等复杂问题,需要完善相关法律规范,确保技术发展安全可控。从《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1.0 版的发布,实现了“人工智能+”的政策法治保障从传统的模式(静态许可+事后追责),转向循环式治理体系(事前评估—事中监测—事后纠偏),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强调“在遵守国际法、尊重国家主权和发展差异基础上,推动构建包容、公平的多边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再到《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强化政策法规保障,加快形成多元协同、跨界融合的人工智能治理格局,中国不

断加强全球治理倡议新兴重点领域的立法布局,积极推动国际法治体系构建,夯实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的法治之维。

(三) 话语路径论: 践行多边主义, 构建治理共同体

单边行险、多边致远。全球治理倡议话语以践行多边主义、构建治理共同体为载体,“坚持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协商取代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开出了治本良药,指明了发展路径。第一,全过程、全方位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倡议话语强调多元主体积极性的发挥,每个治理主体都有自己的优势所在,要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形成合作最佳状态,实现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的理想效果。于全过程而言,从治理前的谋篇布局,到治理中的全局展开,再到治理后的评估优化,主权国家及其政府机构、跨国公司、个人等多元治理主体既要“在场”,以饱满的热情、充足的干劲参与治理各环节;又要加强对话和合作,凝聚治理优势合力,加快优势向实践效能转化,推动更有力、更强劲、更可持续的全球发展。从全方位来看,国际社会安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生态环境保护等各领域均需要联合治理。一方面要坚持筹谋各域,清晰把握全球治理系统中各要素的地位、作用及彼此间联系,切忌顾此失彼;另一方面要坚持统揽全局,从总体性高度整体把握全球治理格局,善于抓住“重点域”,以关键领域问题的解决带动系统的整体突破,达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提升全球治理整体效能。第二,建设国际多边治理平台。全球治理新平台旨在解决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顽疾,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既要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平台发展壮大,带动相关国家基础设施、经贸合作、人文交流领域互联互通的发展潜力,以区域性合作共赢能力强化及和平发展增效赋能全球治理能力提升;又要借助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主导力量,加快“一带一路”、二十国集团等全球性治理平台建设,推动形成兼顾包容性、多样性的治理框架和公平、正义的合作范式,助力人类治理共同体构建。

(四) 话语价值论: 倡导以人为本, 增进治理福祉

人民是治理的主体和目的。全球治理倡议话语以人民为中心,将增进人民治理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在治理中依靠人民、保障和增进人民获得感,以治理促发展、提高全球发展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第一,全球治理依靠人民。坚持治理依靠人民就是要最大限度凝聚各国人民共识,增进彼此治理信任,充分依靠世界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从情感维度来看,全球治理倡议话语以有温度的语义表达与感性语境营造,精准把握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治理效能和发展话语权的内心需求,调动不同治理主体感知,建构群体关系联结和维系合作行动的认知框架,契合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希冀;柔性的语境创设“双向性”的情感互动联结桥梁,拉近受众间的心理距离,增进信任感、信服感和支持感,深化各国人民治理情感共鸣共通共联,极大地调动人民参与合作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现实层面来看,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依靠人民增强全球治理的内生动力和实践效能。比如在全球安全治理上,借助社交媒体传播维和反恐、核安全观等和平理念,减少极端主义的文化生存空间,通过实地调查、数据整理、宣传报道等推进安全议程设置和政策落地实施;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上,奉行低碳生活方式,贯彻人与自然是有机体的原则,践行可持续发

展的生态理念，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注入新内涵；在全球网络治理上，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积极参与更新全球网络安全治理规则，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第二，全球治理为了人民。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从50个“心联通 云南行”民生项目落地13个国家，到计划100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惠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基层民众，主动对接相关国家发展规划，聚焦民众生活中的痛点和难点，现已建成覆盖全球的高速公路、高铁、港口、桥梁、电站、体育场等基础设施网络。高标准、惠民生的“中国建造”，既促进全球经济繁荣与发展，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还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全球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各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显著提升了各国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为全球治理格局优化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新时代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实践表明，治理成果越是惠及各国人民，为其带来更多幸福感和安全感，人民就越对全球治理充满信心和美好憧憬，就越能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形成良性循环。

（五）话语原则论：注重行动导向，提升治理效能

行动是治理实践的导向，为全球治理的行之有效注入动能。全球治理倡议话语以注重行动导向、提升治理效能为话语原则，蕴含深厚的治理意涵。第一，坚持标本兼治、破立并举。全球治理倡议话语具有“打断其他话语、建立新的对象和新的作用领域的能力”^[4]。在深刻剖析全球治理“有治无理”现状基础上，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突破冷战思维、丛林法则、零和博弈、“普世价值论”的旧有话语逻辑，创新性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指出世界各国在治理领域利益深度交融、紧密相连，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时，利益交集伴随融合深入而扩大，全球治理倡议话语高举治理体制机制变革旗帜，坚定战略定力，提出新倡议、制定新方案、采取新行动，以循序渐进的基调，采取分阶段、分步骤的方式实施，努力寻找最大利益公约数，不断巩固命运共同体纽带，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第二，坚持实践导向，促进治理效能转化。实践导向构成治理效能转化的核心逻辑，其能动性表征为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内生动力。全球治理倡议话语倡导在尊重彼此差异基础上寻求最大程度的契合点，把差异这一阻力转化为世界发展的新动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推动全球治理进入“由治理效能向发展动能转化”的新阶段，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知。第三，坚持以实际问题为检验标准。“有效性是用以衡量社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或影响国际行为的一种尺度”^[5]，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确立了三个维度的评估框架：以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权威性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有效性、以决策效率与执行能力为衡量的过程有效性、以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度为呈现的结果有效性。具体表现为：在制度层面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操作层面提升应急反应和透明度，在价值层面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这些标准为行动导向提供了可量化的指标体系，特别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机制将治理效能转化为实际发展成果。

三、立体语效：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的价值意蕴

全球治理倡议话语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治理创新的智慧结晶，既系统总结了我国在

全球治理领域的突破性贡献，又直面当前国际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重塑了国际秩序变革的正义性叙事框架。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全球治理战略体系、壮大全球南方舆论声量和发展力量、有机衔接“三大全球倡议”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一）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全球治理战略体系，开创全球治理新范式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立足人类社会发展新高度，着眼于推进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因时因势因地建构中国特色全球治理战略体系，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机制革新，加快推动从“西方治理”向“西方和非西方的共同治理”转型。

全球治理倡议话语冲破西方现实主义思想禁锢，超越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旧范式，为世界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成为破解全球治理四大赤字的首要选择。一方面，全球治理倡议话语既借助打造融通中外的原创性概念、超越传统窠臼的标识性范畴来丰富科学化战略体系的建构，又通过直引、引申和化用修辞充分运用经典的格言警句、历史典故和诗词歌赋等文化素材，超越资本主义治理话语的霸权逻辑和对立思维，创造性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义利合一”“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治理理念、“共同尽责”的治理方法、“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治理哲学，进一步明晰了“为何治理”“治理什么”“谁来治理”“如何治理”，形成了中国特色与世界话语兼备的全球治理战略方案，为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区别于“西方治理”多附带各种条件、意图侵犯他国主权、带有浓厚的“普世价值”色彩，全球治理倡议话语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融入广泛主体的联合治理中，摒弃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思维方式，充分考虑兼顾多方的价值观念，以普遍平等为基础挖掘各方共性，尊重各国人民独立探寻发展道路、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找到一条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国家利益冲突，凝聚最大共识和合力之路，通过打造命运共同体化解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更加全面地反映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治理新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更为坚实有力的道义力量。

（二）有利于壮大全球南方舆论声量和发展力量，推动世界秩序转型

话语权的争夺实际上是治理领导权的争夺，掌握了话语权也就掌握了治理领导权。伴随国际舆论生态开始由“西强我弱”逐渐向“东升西降”的转变，以和平为基调的全球南方话语体系逐渐在世界舆论舞台崭露头角。“特别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6]，全球治理倡议话语的提出成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关键一步。

“全球治理体系转型推动了全球政治语境下话语权内涵与外延的延展，各主要国家和国际行为体纷纷提出自身关于全球治理的相关理念。”^[7]全球治理倡议话语将不同国家、地区和利益相关方纳入治理参与共同体，依靠集体行动解决全球治理难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与之相匹配的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利，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真实治理利益诉求，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权和参与权，壮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舆论舞台的声量和体量。随着多元主体参与合作治理的推进，中国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合作共赢之路，提出更为包容和民主的治理模式，积极推动改革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不合理部分，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与贡献相

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多样化合作,赢得了更多发展机会和空间,整体影响力大幅提升,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提升,有力铲除了全球发展赤字的滋生土壤。

全球治理倡议话语诠释了新的变局下东方大国持续推进全球治理的立场、观点、方法,传递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最强音,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一方面,在“南南合作”层面,伴随新兴国家的崛起,原有发达国家主导建构的国际秩序受到极大冲击,其必然会对发展中国家设置更多障碍、限制其发展联合。中国以自身发展优势为全球南方力所能及地提供多种形式的援助,从精准帮扶、技术推广、平台搭建等减贫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攻克减贫难关,到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探索拓宽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降低了全球南方对发达国家“等、靠、要”的依赖,增强其自身发展主动权和集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凝聚起磅礴伟力。另一方面,在“南北对话”层面,全球治理倡议话语架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对话的多边桥梁,摆脱“中心—边缘”旧有发展思路,以更加民主和均衡的共赢式发展为主线,通过刚性制度与柔性理念的有机结合,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协同性和实效性,推动更加可持续的全球发展,为构建稳定有序、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具有韧性的支持系统。

(三) 有利于有机衔接“三大全球倡议”,赢得中华民族复兴的稳定环境

“三大全球倡议”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性问题的态度,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不同维度诠释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全球发展倡议着眼于消除发展鸿沟,以平等均衡为条件、以创新驱动为动力、以生态良好为支撑、以人民普惠为宗旨,为世界共同繁荣发展发出时代最强音。全球安全倡议旨在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实现高质量的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以平等包容为基础、以互鉴创新为动力、以和合共生为追求,开创人类文明发展新格局。“从全球治理能力构建角度看,‘三大全球倡议’是中国引领和推动体系成员实现共同目标的指引,以此凝聚共识、创设新规范、塑造彼此行为模式。”^[7]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文明是进步的动力,治理是稳定的法宝。全球治理倡议指明了解决发展难题的方向,提供了破解世界动荡不定困局的方案,贡献了消除多元文明冲突与对抗的方法,与“三大全球倡议”相辅相成、紧密结合,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全球视野、天下情怀和世界担当。“四大全球倡议”从内在逻辑上将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刻回答了‘以什么样的理念加强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实现路径”^[8],有利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9]一方面,全球治理倡议话语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创新成果,既精准把握国际力量的最新变化,又正确认知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还科学研判时代发展新趋势,拓展深化平等、合作、开放的全球伙伴关系。该话语通过“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

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61]; 夯实走和平发展之路的深厚底色,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好友圈”。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提出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能够为弥补我国发展短板开拓思路,增强更高水平、更深程度、更广领域的跨国合作,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促进我国综合实力的整体提升。同时,助力我国以全球治理引领者的担当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增进国际受众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解与支持,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形象亲和力和话语说服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争取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 ㉔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N]. 人民日报, 2025-10-29 (01).
- [2]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8.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40-541.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515.
- [5]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22.
- [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71.
- [7] 张凤阳, 李智. 从“革命—斗争”话语到“改革—治理”话语: 以党代会报告文本为中心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2): 5-14.
- [8]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56.
- [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10]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N]. 人民日报, 2024-06-29(02).
-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448.
-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540.
- [1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 [N]. 人民日报, 2015-10-14(01).
- [14]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2卷 [M]. 俞可平,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650.
- [15] 詹姆斯·N. 罗西瑙. 没有政府的治理 [M]. 张胜军, 等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187.
- [16]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50.
- [17] 孙云飞. 论“三大全球倡议”与中国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5(3): 158-166.
- [18]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N]. 人民日报, 2024-01-09(03).
- [19]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6: 274.

【责任编辑: 张晓妍】